

異域文學之光：

陳世驥與魯迅及波蘭文學

陳 國 球^{*}

一、「抒情傳統論」與陳世驥的著作

「抒情傳統」之論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具體成型。其中最重要的推手，是北美華裔學者陳世驥（1912-1971）。他在 1971 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的比較文學小組致開幕詞，講稿被譯成中文，題作〈中國的抒情傳統〉；文章刊出後傳誦一時，再經幾代學者發揚，幾乎成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共識。回顧「抒情傳統論」的發展，研究焦點與態度方向，已有不少變化：由古典文學到現當代文學、由本體論到認識論、由中西比較到古今對話，以及許許多多具體文學現象的詮釋與重新認知，其影響既深且廣。在現代狀況下「抒情論述」如何與爲何開出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路向，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其中奠基者陳世驥由北京到柏克萊的學思歷程，尤具象徵意義。過去學界對他的認知，主要依靠他的弟子王靖獻（楊牧）所編的《陳世驥文存》一小冊，於 1972 年由臺北志文出版社刊行。及至 2015 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由張暉（1973-2013）新編的《中國文學的抒

* 作者現爲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暨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

情傳統：陳世驥《古典文學論集》，增補不少文章。經過多年的累積，現今學界大抵對陳世驥的生平以至學術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不過由於陳世驥仍有不少重要文章未及著錄與流播，以致大家對他的學術成就以及他的「抒情傳統論」未能準確評估。例如〈波蘭文學在中國與作為「摩羅詩人」的密茨凱維奇〉就是值得關注的一篇佚文。

二、陳世驥讀魯迅〈摩羅詩力說〉

〈波蘭文學在中國與作為「摩羅詩人」的密茨凱維奇〉(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一文刊於1956年出版的《世界文學中的阿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 in World Literature*)，可說是陳世驥對魯迅(1881-1936)在半個世紀以前發表的〈摩羅詩力說〉的閱讀與詮釋。¹

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寫於1907年，發表於1908年2、3月；²即光緒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滿清皇朝日薄西山的時候。當時魯迅留學日本，在異域中讀古國文化史，想到印度、希伯來、伊朗、埃及等古文明，「燦爛於古，蕭瑟於今」；由是感懷故國，思量如何發揚「國民精神」：

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
(頁58)

魯迅認為有必要透過比較的視野，審察外國的經驗，以反思本邦未來

¹ Shih-hsiang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in *Adam Mickiewicz in World Literature*, ed. Waclaw Lednic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569-588.

² 〈摩羅詩力說〉，原刊《河南》月刊第2、3號(1908年2月、3月)，署名令飛；收入魯迅：《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56-108。以下引用以《墳》本為據，僅註頁碼。

的取向。觀察與比較的目光，於魯迅來說，就應該放在寄寓「心聲」的詩歌之上：

蓋人文之留遺後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闕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其聲度時劫而入人心，不與緘口同絕；且益曼衍，視其種人。（頁 56）

而異邦詩歌中：

力足以振人，且語之較有深趣者，實莫如摩羅詩派。（頁 59）

至於何謂「摩羅詩派」？魯迅作出如下的界定：

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凡是群人，外狀至異，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為光華；而要其大歸，則趣于一：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頁 59）

這個定義重點在於「反抗」、「挑戰」、「爭天拒俗」，要求詩歌能刺激、振動人心；而其基本觀點是詩的作用與人的本能是相通的：

蓋詩人者，櫻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激於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破。（頁 61）

魯迅一方面說「摩羅詩派」是異邦新聲，但另一方面卻指出這新聲其

實也源自「凡人之心無不有詩」的普遍人性。³ 看來傳統詩學的「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⁴ 的觀念，也是「摩羅詩力」的基礎；只因本邦「後賢」盡力「設範以囚之」，才有「持人性情」、「詩無邪」等違反人性的主張。（頁 61）所以異邦的「摩羅詩派」其實是在普遍原理之上發揚其動態的面向，而為詩的目標仍是「發為光華」、「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也唯有在這種體認和主張之下，「別求新聲於異邦」才有可能，才有意義。

陳世驥這篇在 1956 年發表的文章，對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有以下這些重要的觀察：

- （一）相對於清朝末年知識界追求西方科技物質上之富強、淪為口號的「眾治」，青年魯迅的思想絕對超前；他接引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等的哲學思想，以人為本，認同「個人主義」。⁵
- （二）魯迅對大眾群相謳歌西歐以及美國之財富物力，不以為然；他關心苦難中被壓迫的民眾，支持「革命理想主義」（revolutionary idealism），重視弱勢的斯拉夫民族——尤其波蘭——的文化與藝術。⁶

³ 魯迅又說：「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頁 64）

⁴ 〈詩大序〉，見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據嘉慶二十年〔1807〕重刊宋本），卷 1，頁 13。

⁵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73. 魯迅〈破惡聲論〉也提到：「故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洞矚幽隱，評隲文明，弗與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詣。」見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2。

⁶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73-574. 魯迅在不少文章提及對波蘭的好感，例如〈破惡聲論〉說：「波蘭雖素不相往來，顧其民多情愴，愛自繇，凡人之有情愴寶自繇者，胥愛其國為二事徵象，蓋人不樂為自隸，則孰能不眷慕悲悼之。」〈題未定草·三〉又說：「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于心心相印。」分見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頁 30；《且介亭雜文二集》（北京：人民

(三) 魯迅早期的文言文論述標誌了他個人的思想史歷程，尤其這篇以典雅而充滿詩意的古文寫的〈摩羅詩力說〉，從視野到文體，都貫注了魯迅對本邦文化傳統的關懷。⁷

陳世驥這些半個世紀以前的洞見，多年後才有其他魯迅研究者陸續注意而加以探究。⁸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分別討論了裴倫 (G. Byron, 現今通譯拜倫, 1788-1824)、修黎 (P. Shelley, 雪萊, 1792-1822)、普式庚 (A. Pushkin, 普希金, 1799-1837)、來爾孟多夫 (M. Lermontov, 萊蒙托夫, 1814-1841)、密克威支 (A. Mickiewicz, 密茨凱維奇, 1798-1855)、斯洛伐支奇 (J. Słowacki, 斯洛伐斯基, 1809-1849)、克立旬斯奇 (Z. Krasiński, 克拉辛斯基, 1812-1859)、裴象飛 (S. Petőfi, 裴多菲, 1823-1849) 等「摩羅詩人」；然而陳世驥則只聚焦於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這個選擇固然有可能出於實際的需要：《世界文學中的密茨凱維奇》一書由美國波蘭文理學院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merica) 為紀念密茨凱維奇逝世一百周年而編集。陳世驥應邀撰稿，文章必然與密茨凱維奇密切相關。然而，我們閱讀這篇文章時應該注意的是：20 世紀中葉在美國的陳世驥如何閱讀與詮釋 20 世紀初在日本的魯迅對密茨凱維奇的詮釋。

正如上文所述，魯迅的確對波蘭文學有所偏愛，而陳世驥也細心

文學出版社，1958 年），頁 111。

⁷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74. 魯迅在《墳》的〈題記〉說：「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墳·題記》，頁 1。

⁸ 參考 Jon Eugene von Kowallis, "On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Lu Xun's Early Classical-Style Essays of the Japan Period,"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 no. 2 (Nov., 2016): 357-399. 寇志銘 (Kowallis) 在文中詳細交代中外學界對魯迅〈摩羅詩力說〉等早期文言論文的接受史，可惜他沒有注意陳世驥這篇 1956 年的論文。

地從相關的傳記資取證，⁹ 他認為：

在此時，即便有著語言隔閡且地理位置相距遙遠，波蘭文學中一道偉大的光芒，早已深深觸動魯迅的想像力。或許不能說是出人意表，但確實也如奇蹟一般，這道照亮魯迅這顆偉大的中國文學心靈的光芒，就是早已享富盛名近半世紀的密茨凱維奇。¹⁰

為陸機（261-303）〈文賦〉中閃耀的光芒所撼動的陳世驥，想像到魯迅心靈也曾觸動於密茨凱維奇在半世紀前開始照亮人心的文學之光。¹¹ 他認為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擺落當時盛行於中國知識界的庸俗的物質主義和淺薄的「民主思想」，彰顯「文學的尊嚴與功效」（the dignity and efficacy of literature），啟迪了眾多新一代的中國作家。¹² 陳世驥又認為魯迅這篇文章開首關於拜倫以至雪萊的論述，較多宗教神學意義的聯想；到了中段談論斯拉夫詩人時，就轉入人間世，所感應的盡是民族感情以至人格德行等人世事。換句話說，陳世驥對魯迅的閱讀，就在於後者如何感應密茨凱維奇詩篇中的人情。¹³

⁹ 陳世驥曾參考小田嶽夫《魯迅傳》及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的說明，見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74, 577。有關魯迅對波蘭文學的態度，又可參考李堅懷、賈中華：〈異域盜火——論魯迅與波蘭文學〉，《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8月），頁55-59。

¹⁰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74.

¹¹ 陳世驥曾英譯陸機〈文賦〉，並作繫年考證，合為一文，題作〈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Shih-hsiang Chen,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in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 (Peiping: Peking University, 1948).

¹²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75.

¹³ 魯迅的確關心人間世，但密茨凱維奇一生經歷和文學觀卻不乏宗教神學甚至非正統的神秘教義的影響。參考 Jan Parandowski,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Work of Adam Mickiewicz," in *Adam Mickiewicz 1798-1855: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His Death*, eds. Jan Parandowski et al. (Paris: UNESCO, 1955), 11-35; Wiktor Weintraub, "Adam Mickiewicz, 1798-1855: A Biographical Sketch," in *Adam Mickiewicz in World Literature*, ed. Wacław Lednic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589-601.

他明白由於當時書冊匱乏、加上語言的隔閡，魯迅其實未必能直接閱讀密茨凱維奇的作品，只能透過勃蘭兌思（Georg Brandes，1842-1927）的間接述說。¹⁴ 有關〈摩羅詩力說〉的取材所據，日本學者北岡正子作了很細密的查考對照，從中我們更加清楚見到魯迅論述與材源之間的異同和依違所在。¹⁵ 陳世驥未及看到這些考證，但還是能夠從細讀中忖度魯迅如何理解密茨凱維奇。他認為魯迅在閱讀密茨凱維奇的過程中，添加了許多中國傳統的想像。例如密茨凱維奇因初戀失敗而走上浪漫主義之路；其初戀對象本是出身名門，魯迅卻稱之為「鄰女」，陳世驥以為這種安排讓讀者以中國社會常見之少年暗戀鄰家女孩的故事作想像；又例如密茨凱維奇與俄國詩人普希金有往來交誼，陳世驥又指魯迅根據傳統文人結交時以詩互相贈答的習慣來比附兩人的不同作品。陳世驥可說運用了他的「抒情式」閱讀，嘗試了解魯迅為文時的用心。

陳世驥也注意到魯迅論密茨凱維奇之為「摩羅詩人」，其要緊處在於「復仇」之聲。他說這聲音並非源自「摩羅」與「上帝」之爭，而是人間的抗爭英雄與壓迫者的對壘。魯迅引錄《先人祭》（〈摩羅詩力說〉作《死人之祭》）中三個囚犯分別唱的歌，然後作總結說：

報復詩華，蓋萃于是；使神之不直，則彼助自報之耳。（頁88）¹⁶

陳世驥的判斷是魯迅正當辛亥革命前夕，密茨凱維奇那借來的聲音，正四處噪盪。¹⁷ 不過，魯迅復仇之念，可能有更具體事由：〈摩羅詩力說〉撰寫的於1907年；該年7月，魯迅同鄉徐錫麟（1873-1907）、陳伯平（1885-1907）、馬宗漢（1884-1907），以及秋瑾（1875-1907）等

¹⁴ George Brandes, *Poland: A Study of the Land, People, and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3).

¹⁵ 北岡正子著，何乃英譯：《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

¹⁶ 參考 Brandes, *Poland: A Study of the Land, People, and Literature*, 260-261.

¹⁷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80-581.

因「安慶起義」失敗，相繼被滿清政府殺害。消息傳到日本，魯迅當時內心的怨憤，可以推知。¹⁸

然而，魯迅意識到自身不是行動者，他的使命是文化批判。〈摩羅詩力說〉最後一節說：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頁 93)

魯迅在往後的日子，的確以「精神界之戰士」自任。陳世驥指出魯迅日後的革命文學理論，意識上以「摩羅詩人」為前驅；〈摩羅詩力說〉所宣示的反抗精神，可說是 1917 年文學革命的先導；「新文學運動」要對抗古老落後的社會制度、道德陋習與頑固偏執，必須有強大的戰鬥力。魯迅以《狂人日記》、《阿 Q 正傳》等小說衝擊舊中國，繼而以雜文作匕首投槍，批判時弊；陳世驥認為他已然化身為中國的「摩羅詩人」。¹⁹

三、從中國閱讀波蘭

〈波蘭文學在中國與作為「摩羅詩人」密茨凱維奇〉一文的結構方式也值得我們注意。魯迅於 1907 年完成的〈摩羅詩力說〉是全文焦點，約占一半篇幅。然而陳世驥的文章是以 1921 年 10 月文學雜誌《小說月報》的「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作起結。從他引述專號的〈引言〉，我們很容易會理解其關心所在：

他們〔按：指「被損害的民族」〕中被損害仍舊向上的靈魂更

¹⁸ 參考 Jon Kowallis, "Lu Xun and Terrorism: A Reading of Revenge and Violence in *Mara and Beyond*," in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 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 1900-1940*, ed. Peter Zarrow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83-97.

¹⁹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81.

感動我們，因為由此我們更確信人性的砂礫裡有精金，更確信前途的黑暗背後就是光明。²⁰

這裡「黑暗」與「光明」的比喻，正是陳世驥閱讀〈文賦〉時的感受。按照他的閱讀，「專號」中有關波蘭的描述是以「抒情的語言」(lyrical language)出之，當中充滿親近相通的情愫，有力地表達了高度的推崇；同時，「對於中國人來說，從這個國家的身上可以奇妙地看到自身的影子」。

以《小說月報》打開話匣子以後，陳世驥更展示他對事況起源的興趣；²¹開始追溯波蘭與中國的關聯。他以波蘭史家揚·德烏戈什(Jan Długosz, 1415-1480)寫於1455-1480的《波蘭史》(*Historiae Polonicae*)、1370年貝瓊應召編修的《元史·朮赤傳》，以及俄羅斯漢學家貝勒(E. Bretschneider, 1833-1901)《中世紀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 1888)的發現，串連起波蘭與中國同被蒙古人侵害的災劫歷史；再以濃墨重筆刻畫〈摩羅詩力說〉面世以前20年，康有為(1858-1927)向光緒帝(1871-1908)呈上所撰的《波蘭分滅記》所引發的晚清政治危機：康有為以波蘭歷史上被三次瓜分的悲劇作借鑑，勸光緒帝實行變法圖強，以免重蹈被列強瓜分的覆轍；結果引發「戊戌政變」，慈禧太后(1835-1908)重掌政權，光緒帝幽囚，「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逃亡海外。陳世驥指出中國多難，與意想中的波蘭同病相憐：

在1898年的政變之後，中國仍處於革命、內戰與外國強權侵略交逼所帶來的動亂與苦難之中。對於中國人來說，波蘭所呈現的形象是另一個同樣遭逢磨難的國家，一個他們認為具備了

²⁰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69; 〈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引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0號，1921年10月，頁2-3。

²¹ 參考陳國球：〈陳世驥論中國文學——通往「抒情傳統論」之路〉，《漢學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頁231-235。

諸多美好品德與格調，並進而喚起自身認同與同情之心的兄弟之邦。²²

以下陳世驥就進入魯迅〈摩羅詩力說〉的討論，以魯迅對密茨凱維奇的閱讀闡發文學的信念，再藉由這位偉大詩人燃亮之光引領，回到 1921 年前後《小說月報》翻譯波蘭文學的意義。

陳世驥認為當時波蘭文學的介紹，是有意的選擇；經過譯者的處理，《小說月報》上的作品「呈現出某種一致性」、「足以說明波蘭文學在中國的呈現方式與精神內涵」、「深受中國讀者喜愛」。陳世驥把當中的性質作出如下的歸納：

當中縱有深沉的憂鬱，但絕不會有灰暗陰鬱的悲觀主義；有著悲哀，卻不失去歡欣與幽默的心；或許秉持著反抗的精神表達異議，但卻少見極端憤怒的怒吼或狂暴的心緒。中國人也格外看重並珍視波蘭作者那超乎尋常的細膩感性，這份感性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表露無遺。就好像波蘭靈魂中似有某種讓中國人自然而然感到意氣相合的特質，這份特質不僅在自然與生命萬物中找到自身的表達，同時也昇華了與其相合呼應的一切萬物。²³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借波蘭論中國，是陳世驥對他心中的民族文化的描述；這也是他的「抒情傳統」觀的基礎。他注意到這些譯自波蘭的小說一般只有一兩個人物，在他們面前的往往是廣漠的大自然景觀；這好比國畫山水中有疏落的點景人物；波蘭、中國有美感經驗的匯通之處。不過，陳世驥更在意的是當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他看到波蘭作品中「以受盡折磨與掙扎的人性對比大地上的浩瀚無垠」，尤其重要的是：

²² Chen,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573.

²³ Ibid., 583.

在這些故事裡人與自然仍是和諧共存，甚或在自然中找到寄託、啟示或慰藉。然而自然也被人性照亮（humanity in turn illuminates nature）。²⁴

陳世驥說中國讀者在波蘭小說中體味人與自然的共存；實際上他正在中國文化與波蘭文學的對讀中，思量人性（humanity）的照明力量。或者這就是儒家所秉持的「人能弘道」的信念。

在文章的末尾，他不再停留於評論魯迅或一般中國人如何閱讀波蘭作品，而是逕自進行小說的文本分析。他以含英咀華的方式讀戈木列支奇（Wiktor Teofil Gomulicki, 1848-1919）的〈農夫〉和〈燕子與蝴蝶〉、式曼斯奇（Adam Szymański, 1852-1916）的〈猶太人〉、普路斯（Bolesław Prus, 1847-1912）的〈影〉、顯克維支（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的〈二草原〉、萊蒙脫（Władysław Stanisław Reymont, 1896-1924）的〈審判〉、科諾布涅支加（Maria Konopnicka, 1842-1910）的〈我的姑母〉。這些波蘭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在面對外在無端的廣漠時，往往顯示出「恆久無盡的忍耐與最純真無垢的心靈，將一切擔負在他的肩頭」；更見深義的是「身處在我們當中驅逐黑暗，但卻不為人們所見」的「荷光者」。陳世驥在這些作品中看到足以啟迪「中國新文學運動在1920年代早期的發展」，例如其中有以「寫實粗獷的筆法描繪農民……，庶民性被轉化為理想化的無產階級性質」，有以「細膩地刻畫一位獨身女子和兒童在相處時複雜而微妙的心理情結」，於中國「革命文學」及「女性主義文學」的產生，有著推波助瀾的效果。²⁵

陳世驥之閱讀魯迅、閱讀波蘭文學，看來是他讀陸機的延續。他在尋繹文學的「光」，思索文學在紛亂、黑暗世界的意義。在他心中，「光」就是「人性」高尚而堅韌的一面。這個求索而得的信念，支撐了他在多難的時局中往中國文化的人情深處探照，他在學術路上的

²⁴ Ibid., 583-584.

²⁵ Ibid., 584-586.

「抒情傳統論」也緣此而生。